

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的历史地位

田 利 军

内容提要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著作。由于它曾经过多次大的修改和补充,因而党史界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或失之过高,或失之过低。本文通过对该著作的几种不同版本的对照研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毛泽东 阶级分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阶级分析》)是毛泽东在国民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著作,历来为史学界重视。有同志对它评价甚高,认为它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明确的纲领性文献”,“深刻阐明了党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1]，“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2]。但也有人认为：“一九五一年《分析》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同志又作了很大的改动,增加了关于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3]。还有人甚至认为《阶级分析》只应看作一般文章。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究竟应处于什么地位,应作何种评价,确实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要正确评价《阶级分析》,就必须首先明确我们立论的依据,否则各执一端,难免有失偏差。据今所见的革命文物证实,《阶级分析》一文最早发表于 1925 年 12 月 1 日,刊登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政治部编辑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随后的 20 余年里毛泽东曾几易其稿并将修改过的稿子公开发表。第一次修改稿发表在 1926 年 2 月 1 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印行的《中国农民》第二期上。第二次修改稿于同年 3 月 13 日开始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周刊第 116 期和 117 期连载。第三次修改稿则收入了 1951 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次修改稿载于 1952 年 7 月第二次印刷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一次修改时,毛泽东正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多,日程紧。所以,对于《阶级分析》的修改只是个别文字上的改动。如“劳动量”改为“劳动时间”、“帝国资本”改为“国际资本”。一个月后,由于认识又有了发展,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主要作了三个删节:

一是将原文第一段中的“策略”一词删去。不再将分清敌友看作策略问题。

二是删去了原文第二自然段开头的“无论那一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则有”的说法。

三是删去了原文中的“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欧西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似奇怪,实际并不奇怪。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目的,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特点”。毛泽东不再将西欧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同中国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简单比附。《阶级分析》在1951年8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毛泽东又进行了精心的修改和补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阶级分析》与第二次修改稿相比,语言更为流畅精炼,思想更为准确深刻,文字修改可谓精雕细琢,其思想内容则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形态^[5]。1952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次印刷时,毛泽东又作了一些字句上的变动。如把《阶级分析》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6]变动为:“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变动很小。这是毛泽东对《阶级分析》所作的最后一次改动。以后各版本,包括1966年7月的横排本、《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均以1952年7月的版本为依据。

纵观《阶级分析》的发表和修改情况,我们可以把第一次发表的原文称为“初版本”。以后几次修改发表的《阶级分析》分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修改本。第三、四修改本体现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形态,同“初版本”差异较大,所以不能作为评价《阶级分析》的立论根据。“初版本”和第一、二修改本均发表在国民革命时期,时间相差不过几个月,修改多属文字技术上的加工,观点没什么变化。因此,它们才可以作为我们认识《阶级分析》历史地位的依据。

在明确立论依据后,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阶级分析》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阶级分析》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发端和萌芽的重要标志。

首先,《阶级分析》一文科学地分析并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同盟者和革命对象。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敌友问题,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阶级分析》中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对革命的态度加以定性。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反动的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8];指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可能的同盟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左翼;确立了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基本的思想。当然,原文中没有“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这句话,但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这一思想却是清楚的。因为原文中的“主力”和“领导力量”是一致的说法^[9]。而且“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中的“革命党”实质指的就是无产阶级政党^[10]。更为重要的是《阶级分析》中的所谓“我们”指的就是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11]。这里可能还有人从原文“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的真正的朋友”这句话出发加以否认。但应当清楚的是:所谓“无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中的“无产阶级”只是指工业无产阶级以外的“无产阶级”,如“都市苦力”、“农业无产阶级”等。不然,《阶级分析》中为什么说200万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而没有说2000万“农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呢?可见《阶级分析》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并非后来加进去的。

《阶级分析》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定性的同时又进行定量分析——这是最显著的特点,

指出了中国革命必胜的前途。因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加上可友可敌的人最多500万,即使如此“依然抵不着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12]

《阶级分析》用这种定量、定性的方法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同盟者所作的极为精辟的分析,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阶级分析》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应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这不仅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初步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

第一,《阶级分析》最早科学地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两面性、动摇性和将来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敌对性。

《阶级分析》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民族革命仍取矛盾的态度。即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因现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到威胁时,又怀疑革命”,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当然,“他们(民族资产阶级——笔者注)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到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一定要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13]。这是具有很高水平的认识。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没有达到这个水平,1925年11月他在《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一文中说:“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它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它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14]。数年后,“左”倾冒险主义者也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他们不是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中可能的同盟者加以争取,而是把他们和富农一起作为主要的革命对象加以打击,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造成了严重后果。

第二,《阶级分析》最早明确地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欲望是发展到大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主张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现实可能性。这也是具有很高水平的认识。当时无论党的领导机关还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都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15]。至于陈独秀和瞿秋白,虽在1925年就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但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16]。瞿秋白虽然指出“资产阶级总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想统辖无产阶级”,并承认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但又说:这一阶级在中国还很幼稚,“还没有变成独立而且集中的政治势力之可能”^[18]。因此,《阶级分析》的科学论断不仅对纠正当时的一些不准确认识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形成也有重大意义。不仅如此,《阶级分析》还批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指出他们想建立由资产阶级独裁的国家政权“是完全不行,因为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一是以第三国际为首的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一是以国际联盟为首的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那些中间阶级,“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从上可以看出,《阶级分析》的这些认识正是后来《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基本思想的雏形。《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的基本思想则是《阶级分析》这些认识的高度发展和成熟。所以,《阶级分析》应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和

萌芽的重要标志。不过,把它看作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明确的纲领性文献”则是不恰当的,因为《阶级分析》还存在很多不妥当之处。

其一,《阶级分析》把一国之人分作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认为在农村“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20]这是不准确的。所谓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以榨取剩余价值为主的阶级;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完全或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主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在农村,正如《阶级分析》所言:“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农业”。因此按现代工业社会的标准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划分为五个阶级,把大地主划入大资产阶级、小地主归入民族资产阶级显然是欠妥的。同样,《阶级分析》认为大资产阶级“与民族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22],也是不确切的说法。虽然它对确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方面有重要意义,但这种分析却是静态的而非辩证的分析。我们姑且不论《阶级分析》中的“大资产阶级”还包括与外资有密切联系的“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官僚军阀(如张作霖、曹琨等)反动派知识阶级——上列四种人之附属物,如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就事实来看,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大资产阶级并不是整个的、始终的、绝对的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反对民族革命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是可以参加反对某个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的。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和同年与人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中对此作了辩证的、准确的和科学的论述。他说:“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还说:“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这样的大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

其二,《阶级分析》认为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24]。这种以知识的多少,从学校的大小,从事职业的高低来给知识分子划分阶级显然是不妥的。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剥削别人。相反地他们作为脑力劳动者还受到一定的剥削和压迫,因而不应该把他们归入民族资产阶级。至于把他们划分为左、右两翼,认为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在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则更是错误的。与此同时,《阶级分析》把受过不同教育的学生的“土气”和“洋气”与“买办”和“非买办”划等号,把卖洋货的买办与接受东西洋文化的学生划等号。他说:“以知识阶级论,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赴东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读书,固然是很明显的除带了半身土气之外,又带上了半身洋气。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资格在国内专门学校、大学校读书,受着那半土半洋回国留学生的熏陶,仍然不免是些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脚色,在这类人并不是纯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可以叫他们做‘半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人乃是中产阶级的右翼”。这种把受过洋教育的学生与洋货商人——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把同时摆土货洋货的商人和受过外国文化教育的小地主子弟,统称为“半民族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右翼显然更为不妥。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

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作了纠正。他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的。”还说：“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25]事实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1931年12月开始，毛泽东在与项英、张国焘代表苏区政府共同签发的多次《告全国民众书》中，已将“革命的学生们”作为全国民众的一部分。在1934年1月所作的《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中则认识到“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1939年12月1日在《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进一步强调“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同年，在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大会讲演中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是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26]

其三，《阶级分析》对整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成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这一点肯定不够。如把小资产阶级分为左、中、右三部分。认为右翼的态度是怀疑革命，中层对革命取中立的态度。只是到了革命高潮时右翼才附和革命，中层才参加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言：“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27]。

其四，《阶级分析》用租佃关系表述农村的阶级关系，把表示阶级、阶层关系的概念（贫农、中农、富农等）与表示租佃关系的概念（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等）相等同。并且只分析了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半贫农、贫农），没有分析农村中实际存在的富农^[28]。众所周知，对富农的认识是阶级分析中不应忽略的重要部分，对富农的认识和态度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大是大非的问题。《阶级分析》在这里是做得不够的。同时，《阶级分析》在分析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是分析佃农（半贫农、贫农）时，也没有反映他们最根本的要求“耕地农有”。事实上，决定农民对革命态度的关键在于革命能否提出“土地农有”的口号并实现它。在这方面，李大钊走在前面，他在1925年冬的《土地与农民》中，就以极为翔实材料说明“耕地农有”是“广大贫农最急切要求的口号”^[29]。毛泽东对此最深刻的认识则是在1926年9月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在那里他极为精辟地指出：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

其五，《阶级分析》认为“产业工人苦力是无产阶级”^[30]。没有把苦力与产业工人严格区分。没有指出无论从苦力从事的职业还是使用的生产工具、劳动组织都说明他们并不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大多只是农村流散的劳动力。在确立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思想时，也缺乏对产业工人的全面分析。没有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实际存在的缺陷，诸如农民意识的浓厚、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文化水平低、人数少等。对此问题，邓中夏在1924年就有所认识，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指出：工人阶级在四万万人中是个小小数目，“何况这些劳动者或为了宗法思想的浸润与遗传有许多尚无阶级的意识与觉悟；或为了军阀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摧残，有许多尚无斗争的胆力和勇气。”^[31]

《阶级分析》之所以有以上认识之失误，原因在于：从客观而言，社会各阶级的阶级性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在某个阶级还没有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充分显示自己的内在特质时，对这个阶级的认识就有可能是片面的或不充分的。如1925年底，当

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这一主要矛盾还没有激化,因而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某个帝国主义矛盾的一面尚未充分显示时,《阶级分析》中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种说法是很自然的。从主观而言,《阶级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要受著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的认识程度所制约。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因此党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之初,在开始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不可能有什么十分准确而深刻的认识的。毛泽东亦然。对此,我们是不能也不应该苛求于他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阶级分析》并不如有人所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纲领性文献”。但也不是有人所说《阶级分析》中的许多光辉思想,如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后来才加进去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应该是,在中共的初创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尝试中,《阶级分析》是走在最前面的。它所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分析》是中国社会历史环境下阶级分析论的典范,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论的理论基础。完全可以这样说,既然敌友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核心问题。那么,对中国的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进行了科学分析,并第一次正确解决了敌友问题的《阶级分析》,实际上就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发端的重要标志。

注释:

[1]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2]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3]郭罗基《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1979年《红旗》杂志第3期。

[4]《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5] [26]参见刘利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三次修改》,《求索》(长沙)1990年第4期。

[6]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1年10月北京第一版。

[7]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二次印刷本。

[8] [12] [13] [19] [20] [21] [22] [24] [30]引自《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第四期。

[9]参见李竹雪、赵军先《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历史意义》,《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0] [11]参见陈荣勋、李勤为等《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

[14] [16]《六大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97页、350页。

[15]《中共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编,第89页。

[17] [18]《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198页。

[23] [25] [2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版,第570页、604页、604页。

[29]《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831页。

[28]《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自耕农指中农,半自耕农指下中农。

[31]《邓中夏文集》,1983年版,第32页。